

慕学勋及“慕氏藏书”初考

李 国 庆

内容摘要: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郑裕彤东亚图书馆的“慕氏藏书”,乃北美中文古籍收藏中可观者之一。原书主清末民初慕学勋,山东蓬莱人,历时二十多年,网罗遍及四部,积至四万馀册,编有《蓬莱慕氏藏书目》。不幸慕氏遽而早逝,藏书几经周折,1935年落户北美多伦多大学。倏忽八十多年,因无现代书志,且又远隔重洋,不易查检,国人惟凭二三者介绍,略知大概。然管窥蠡测,讹误难免。而以讹传讹,有至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之势。本文爬梳文献,证以最近披露之慕氏藏书印章,以期为慕氏正名号,还历史以真相。

关键词: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 慕氏藏书 慕学勋 慕玄父藏书印

一、藏书“述概”

国内学界对慕氏及其藏书的介绍与研究,之前主要可依靠者,惟有《文献》杂志1990年第3期刊载的吴晓玲先生(1914-1995)之《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蓬莱慕氏书库述概》(以下简称《述概》)一文。在中国跟外界隔绝几十年之后,此文首次向国内介绍了慕氏藏书的西传经过和现存状况,嘉惠学林之功不可埋没,只是该文在翻译资料时不够准确,下断语时又稍过随意。因收藏馆详细书目及书志阙如,远隔重洋不易查检,使得后出之有关藏书与藏书家的工具书,如《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山东藏书家史略》、《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中国文献学资料通检》、《中国藏书家通典》、《中国旧书业百年》等,或明或暗地引用《述概》,一路沿误至今。即便是最新出版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提要》^①(以下简称《提要》)也因不察而误蹈覆辙。

《述概》以及此后的所有著述对“慕氏藏书”的介绍简要如此:多伦多大学

^①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郑裕彤东亚图书馆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提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郑裕彤东亚图书馆“慕氏藏书”的原收藏者为慕学勋(1880-1929)。慕氏为山东蓬莱人,字玄文,曾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堂并毕业于民国元年。毕业后,慕氏长期任职于北京德国公使馆,为中文秘书,共十七年。慕氏去世后,其子因到外省任职,而将其父的所有古籍收藏以10500加元的价格卖给了当时加拿大英国圣公会河南区主教威廉·怀特。1933年,慕氏藏书购买成交后,北京美国公使馆退休海军武官吉利斯招募了十名中国学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为慕氏藏书编目。到1935年6月该批图书运抵多伦多时,图书的总量已达五万馀册。其中有怀特在1933至1935年间又陆续在各地购得的一万册图书,包括山东、河南两省的方志和民国时期出版物。

《述概》通篇没有一处引文或转述的说明,给人的印象是作者1985年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时的调查成果。我最近发现,《述概》一文的内容百分之九十译自朱维信、上中修三的《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收藏》^①。

现以两文的开篇为例证明如下:

英文: Unlike most of the medium-size Chinese library collections in North America, that in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with present holdings of over 100 000 volumes, has a history of almost four decades. In March 1933, the Rev. William C. White, the former Anglican Bishop of Honan, went to Peking on a regular missionary trip from his diocese in Kaifeng. While he was there, he was informed by a close friend, Mr. William Pettus, that a fine Chinese collection was available for sale. It consisted of roughly 40,000 volumes belonging to the family of a Chinese scholar, Mr. Mu Hsueh-hs' in (1880-1929), who for the seventeen years prior to his death was Chinese Secretary to the German Legation in Peking.

当页注: Mr. Mu Hsueh-hs' in (courtesy name Hs'ian-fu), native of P'eng-lai district, Shantung, graduate of Peiyang University in T'ientsin.

《述概》: 多伦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虽然只有五十年历史,但是和北美的许多中型汉籍图书馆比较,藏书高达十万馀册,已经具有现代专业图书馆的规模了。

1933年3月,驻在河南省开封府的英格兰教宗韦廉·怀德(Rev. William C. White)主教,因公到北京巡视所属教堂,他的朋友韦廉·庇托斯(William Pettus)告诉他: 蓬莱慕氏所藏约四万册的珍本古籍有出售的迹象。藏书主人慕学勋(1880-1929),字玄文,山东省蓬莱县人。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其后在德国驻北京公使馆任中文秘书达十七年,直到逝世。

中文对英文的亦步亦趋一目了然。可惜的是,这个翻译既不规范、也不准确。

① Raymond W. H. Chu and Shuzo Uyenaka: "The East Asian Library Collection in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acific Affairs*, Vol. 46, No. 4 (Winter, 1973-1974), pp. 548-556.

先说规范。怀德即怀履光。按惯例,凡有汉名的西人应用汉名。而这样做的好处实在很大。以此为例,把怀德译作怀履光,不懂英文的学人也大多知道他的事迹。Anglican直译是英国国教,习称圣公会。因而他也绝不会是英格兰教宗了。同样,庇托斯即裴德士,北京华文学校(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校长。这还不是致命的问题,只是给不懂英文的人添了麻烦。再说准确。北美大多数中型中文图书馆是受惠于美国政府1958年制定的国防教育法案而建立的。朱文写于1973年,所以那些图书馆只有十多年的历史。作者这句话总的意思是多大馆的历史要相对“悠久”一点。原文第二句说,1933年3月,前河南主教怀履光从其教区主教堂所在的开封府前往北京,本是一次普通的公差。因怀氏是河南主教,北京是没有其下属教堂的,故不可能去巡视。怀氏知道慕氏藏书待售,纯属偶然。只是其时他已59岁,即将退休,正在考虑回加拿大从事教学研究,需要这批书,所以志在必得。关于慕氏的姓名籍贯,原文是个注,《述概》将注中的内容结合到正文中,这也无妨;但注中称慕学勋的字是“玄父”,其拼音形式即便在韦氏拼法中也一样,《述概》却作“玄文”。这“父”字与“文”字的形近之误,却误传几十年,贻害极大,以至于假作真时真亦假,非得要做一番考证,才有可能让人信服。此点待下文详述,在此继续说翻译。

继续逐字对比似无必要,为节省篇幅,以下只再举数例,辩证较为重要的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当可自行对照全文。

《述概》接下来讲:“慕氏之子秉承遗志,坚持购藏对方须为研究机构,而诸多此类性质单位的藏书均具相当规模,若购入慕氏藏书全部,势必出现多种副本,因而迟迟不能售出。其时,法国汉学名家保罗·伯希和教授(Prof. Paul Pelliot)正来我国访书,颇有问鼎之意。”原文则说的是,慕氏后人出售的条件是不能打散“慕氏藏书”,要完整保存在一个研究机构里。而这样的机构一般都已具有基本藏书,与慕氏藏书中的大部分重复,所以为避免接受大量复本,大都望而却步。伯希和是其中之一,并没有问鼎之意。

怀氏觉得机不可失,“迅速地提出加币一万零五百元购买全部书籍,慕氏遗族同意了这笔交易,怀德主教当即预付了三分之一的定金”。其实原文说的不是定金,而是书买得便宜,只合当时市价的三分之一。

书买到后,“编目工作是由北京美国公使馆退休海军专员埃·维·杰列斯领导下的十名中国雇员进行的。编目法是根据麦克吉勒大学的葛思德图书馆制定的方案进行的”。该人即前驻华使馆海军武官,汉名义理寿,前此辞去公职,专为葛思德买书。采用的编目法就是他为当年落户麦吉尔大学的葛思德藏书设计的。

《述概》此后说:1953年被任命为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德卜逊教授从多伦多市某合作社组织为图书馆募得捐款加币四万二千元购书费。查原文,那“合作社”其实是Carnegie Corporation,它也不是多伦多、甚至也不是加拿大的。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自1881年起,捐资几千万美元,兴办和资助图书馆。

不但美国受益,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许多外国图书馆也受益。由此可知,多大东亚馆的发展,得到过卡内基基金的资助。

又说:1961年,慕氏藏书加上美术、考古书和五千帖拓本,再加上德卜逊教授补购的图书和期刊集中起来,迁移到多伦多大学的文理大楼第八层,这就是驰名北美的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这一点《述概》完全译反了。原文说慕氏藏书来加后先落户在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61年转交给多大东亚馆时,留下了艺术和考古类的图书,以及五千拓片。明了这一点,读者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列名在慕氏1920年代自编、自刊的《蓬莱慕氏藏书目》^①(以下简称《书目》)中的书,在《提要》和馆藏目录中是找不到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认为《述概》只是一篇不太准确的翻译文字。目前所能见到的对“慕氏藏书”的西传经过和概况的描述,最早和最完整准确的就是朱维信先生的英文文章,我们应该给予他应有的这一荣誉。该文下半段论述多大的日文馆藏,所以有上中修三的文字和署名,可不论。朱先生台大历史系毕业,1963年起任多大东亚馆馆长兼东亚系副教授^②,1974年辞图书馆职,转任全职教授。接任馆长为余梁戴光。几年前在介绍该馆历史和文献时,后者采用的还是朱先生的文字,不过增添了许多注释^③。由这些注释可知,朱先生的叙述源于馆藏有关“慕氏藏书”的档案,包括怀履光的信件,应属可靠。

二、慕氏字号

上文说了,《概述》一出,似乎举世皆认慕学勋字玄文了。大陆学界有过一次纠错的机会,遗憾的是错过了。国家图书馆藏有一册《永乐大典》,袁同礼著录的原藏家为“慕玄父”^④。有人看到就质疑说:“慕玄父,‘父’、‘文’形近,当为慕玄文之误。”^⑤对于这种情况,本该厚古薄今才对,因为同时代人所记,一般比较可靠。最近台湾一位博士生在评论《提要》时也注意到这一点,说慕氏的字“一般或作‘玄文’,根据《提要》中《庄子因》(页272)附书影藏印‘慕玄反藏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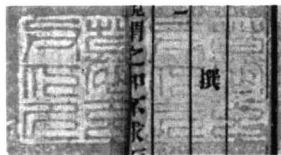
①林夕编:《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31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

②该文署名如此:RAYMOND W. H. CHU,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Bibliographer, SHUZO UYENAKA, Lecturer-libraria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Bibliographer在不同地方有不同译法。接任的馆长称他是馆长(余梁戴光:《令人神往的前景: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周欣平主编:《东学西渐:北美东亚图书馆1868-2008》,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53-169页)。

③余梁戴光:《令人神往的前景: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

④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数续目》,《袁同礼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113页。

⑤赵爱学:《国图藏嘉靖本〈永乐大典〉来源考》,《文献》2014年第3期,第52页。



可以知道慕氏之字当为‘玄反’”^①。

其实此印篆文尚属标准,不难辨认。印见《提要》341《庄子因》六卷,清林云铭撰,清乾隆二年辅仁堂刻本和404《意林》五卷,唐马总撰,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聚珍版上。印文为“慕玄父印”。这两本书,《庄子因》载《书目》第74页,编列号数为21;《意林》载第77页,号为22。两印属于慕学勋应无疑问。

查国立北洋大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班毕业同学录,慕学勋字元辅^②。“元”古同“玄”,清代避康熙帝(玄烨)名讳,以“元”代“玄”者多有。“甫”是古代在男子名字下加的美称,亦作“父”。想来慕学勋的字原是玄父,因避讳而作元辅或元甫。民国之后无须再避,有一段时间两者并用或混用。如李泰棻提到一块埃及棺刻:“此棺铭清端方午桥氏使西洋时所得。后归山左慕学勋元父。”^③慕氏自己为文则径署“玄父”,如《重刊〈忍字辑略〉序》,署“庚申年(1920)嘉平蓬莱人慕玄父作”;《民国时期总书目》著录《希腊埃及时代棺铭考释》作者为慕玄父;《蓬莱慕氏藏书目》第91页、编列号数为31之《柏堂师友言行记》,注曰“蓬莱慕玄父校刊本”。还有在特殊情况下,两者同用的例子,如《近代中国银行业机构人名大辞典》载1919年11月1日开业的溥益银号,是“由沈吉甫、张嘉墩、杨荫荪、慕玄父、徐辑甫、赵润秋、邓宇安合资创办,……监察人沈吉甫、慕元甫……”^④。似乎是为了避自己监督自己的嫌疑吧。可发一噱。笔者认为,根据现有材料,慕学勋字玄父,一作元辅、元甫,可成定案。

从前因“玄文”故,慕氏的生平只能查到“曾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堂并毕业于民国元年。毕业后,慕氏长期任职于北京德国公使馆,为中文秘书,共十七年”等寥寥数条。确定慕氏字玄父(元甫)后,略查民国文献,就可发现,他的短暂人生还是丰富多彩的。

上引《近代中国银行业机构人名大辞典》指出,他是北京第一家银钱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同书还记载了他列名中华储蓄银行(1919)董事。1922年2月创办于北京的同福银号,创办人中也有慕玄父,董事有曹汝霖等。这些在刘兰兮主编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中也有记载。除了涉足银行业,1917年时,慕元甫还是河北峰峰地区上拨剑村(3.56平方公里)和羊台马庄(3.46平方公里)两处煤窑的法人^⑤。

①郭明芳:《评介〈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提要〉》,《东海大学图书馆馆讯》2015年新169期,第100页。

②《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第56页。

③李泰棻著:《西洋大历史》卷一,北京宣元阁,1916年,第131页。

④姜建清编:《近代中国银行业机构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00页。

⑤峰峰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峰峰志》,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143页。

他担任过北洋大学教授,第一届辅仁大学校董和中国大学董事^①;1922年4月24日成立的“京师公益联合会”会记股副主任^②;北京赎路基金会(1921年)发起人^③。

此外,他还客串过报纸翻译。方豪“英斂之先生创办《大公报》的经过”一文第十七条“慕元甫任翻译严又陵入股”曰:“二十一日记曰:‘蓬莱慕元甫来,系前日由严又老嘱王觉臣转荐英文翻译人,甚精爽。交其英文报,先试译一段。’严又老为严又陵先生;慕元甫,亦作玄父,此后成为英先生知交之一;英先生与马相伯先生校刊明末清初教会名著,在经济上多得慕先生之资助。”^④又参与谋划编纂基督教文献。陈垣1917年12月8日自日本大阪致慕元甫函,告知在奈良访得《贞元释教目录》,在大阪访得《破邪集》,所著《元也里可温考》已引起日本学界的注意,以及欲仿《贞元释教目录》之例撰著《乾隆基督教目录》的设想^⑤。

慕氏收藏,不止于书籍。上文已提到一块埃及棺刻,是端方使西洋时所得,后归慕学勋收藏。《中华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概略(1925)》又载:“慕玄父先生赠齐梁隋诸帝画像照片。”^⑥可注意的是,跟他同时列名溥益银号董事的沈吉甫,浙江宁波人,在西交民巷独资开设懋业银行,是北京较早的金融界知名人士,上海朵云轩创办人,也极喜收藏,藏品大多为古代名贵瓷器,达千余件。收藏似乎是那个圈子里共同的爱好,当然也都是有丰厚财力支持的。

有人评论说:“慕元甫系山东蓬莱人,学贯中西,与王正廷(曾任国民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兼外长,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王宠惠(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国务总理等职)、马相伯、应劭芝诸先生是好朋友。慕教授平日重道德,淡仕进。”^⑦

至于慕氏家世,查道光《蓬莱县志》、光绪《蓬莱县续志》及民国县志,仅得慕维德,字如山,嘉庆己卯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著有《松龕古今体诗存》《如山奏议》《修治良规》等。其孙荣干,字次和,同治戊辰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录《通志》。维德曾孙昌治,邑庠生,初佐宋忠勤公戎幕,复随袁世凯赴朝鲜,充仁川领事、釜山副领事。历充抚顺煤税局总办、巡警局总提调、财政局提调。“好聚书,所居插架千万轴”。子二:学笃,庠生,安东电报局长。学光,任浙江

①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8页。《中国大学董事录(1922年6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教育》,凤凰出版社,1994年,第260页。

②《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政治》,第908页。

③《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民众运动》,第703页。

④《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第2053页。

⑤刘乃和:《陈垣年谱附陈垣评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27页。

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文化》,第274页。

⑦陈小平:《湄洲湾建港第一人萧碧川》,海峡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0页。

徐姚验放局监督,先昌治卒。此二人也是“学”字辈,但未知与学勋是何关系。顺便说一句,在考察慕氏及其藏书时,有友人告知,山东大学杜学逊先生做过蓬莱慕氏藏书的文章。经查,那是慕湘(1917-1988),解放军少将,在蓬莱县有慕湘藏书楼。两者没有关系。

详考慕氏生平,并非这篇小文所能胜任,以上抛砖引玉而已。然就这些资料来看,慕氏乃清末民初那一代既有旧学根基、又通晓西方文化的精英之一,领时代潮流之先,游政学工商四界,藏书看来只是其不太经意的副业。

三、藏书评估

《述概》对慕氏藏书的价值是这样评判的:“慕氏藏书相当芜杂,作为一般阅览,显然门类不够广泛;作为专业利用,则又嫌有所不足;只能说是一个旧派读书人的私藏,足供个人遮眼消闲而已。”《提要》则认为慕氏藏书除具有与其他中国传统私人藏书类类似的特点外,还有这样一些独特之处:1.以慕氏所任职位来看,他不可能有当时著名私人藏书家所具有的殷实经济实力来蒐罗古本、善本图书。但他独具慧眼、扬长避短,得身在京城之利,搜罗清代的官刻图书、钞本、稿本、朝廷老档等。2.慕氏所藏之史部古籍,方志所占比例颇大。其中以山东、河南两省的县志尤多。3.由于慕学勋长期在德国公使馆任职,对域外风土文化、西学东渐等颇有兴趣,这些方面的图书也自然是他收藏的重点之一。4.慕学勋曾搜集了一些其他藏家所藏的善本。

评估慕氏藏书,目前我们所有的可靠依据,一是慕氏自编、自刊的《书目》,著录2551种书,分属经史子集丛杂六部。除有书名、撰注者、版本、卷册数、函数等内容外,尚有备考一栏,简记各书的刊刻、收藏与用纸等情况;二是该馆最近编撰的《提要》,收录该馆所藏至清乾隆六十年(1795)的所有中文古籍善本,以及民国元年(1911)以前所有抄本、稿本,共计625种。按《提要》编者的介绍,也就是慕氏藏书中的善本这部分。各条目的撰写体例依次为书名、该馆藏书号、卷数、著者、版本、册数、版框尺寸、行款、扉页、序跋、凡例、目录、牌记等。其后有著者简介、卷次、内容简述、著录、钤印、刻工等。就藏书内容而言,他们给出了普通古籍和善本古籍的大概面貌。在这一点上,《述概》和《提要》的论断大体是准确的。但是由于上文指出的误解,特别是印章、题跋等部分,前者十分简略,所记不足以考察其来源。后者因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受条件所限,当时并没做完善,使得原能揭示藏书来源和递传等重要信息的线索湮没不彰,而他们的有些论断也需要订正。

慕氏藏书之所以芜杂,个人认为从现有资料看,主要并不是因为那是一个旧派读书人的私藏。他有一个固定的职业和几个副业,都与藏书无关。收藏似乎只是他的一种业余爱好,应当也有保值和投资的考量。《提要》所录625种书上,有慕氏藏书印的只有两种,而且也不是钤在最珍贵的书上,并不像一般藏书家那样有“子子孙孙永宝藏”的打算。题跋则一条也没有,更没见任何相

关著述。从本文揭示的慕氏生平看,他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来搜罗古本、善本的。只是因为并不著力于此,所以仅凭身在京城之利,随时收取当时市面上可见的较为珍贵之书,并无重点。其时正值改朝换代之际,清代的官刻图书、朝廷老档以及名家旧藏钞本、稿本等流入书肆颇多,被他得到,乃属随机的幸运。

这也可以《提要》所收625种善本书上的藏书印来证明。这批善本书上的鉴藏印所反映的藏书名家多至数十家,但大多每人都只有一二种而已。

比较有意思的一本是《福堂寺人小草》,即《提要》257号,明刘若愚撰,明钞本。上有钤印:“虞山张氏”“味经书屋收藏”“臣蓉镜印”“小琅嬛福地秘笈”“曾藏张蓉镜家”“润碧轩”“邵渠印”“秘殿紬书”“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琴川张蓉镜寓目”“沈直涛”“芙川氏”“黎川万成公二十五世孙”“秋谷”“孙镐”“芭溪”“怡燕堂”等。



常熟张氏,张应增、张燮、张定球、张蓉镜四代嗜书,陆续建立了小琅嬛福地、味经书屋、双芙阁藏书,为常熟著名书香世家。张应增曾任蒲江县令。子张燮,字子和,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官至浙江宁绍台兵备道。告假归,掌教绍兴蕺山书院。孙张定球,字伯温。诸生。由国史馆誊录选兴国场盐课大使,会缺裁,授长芦石牌坊大使。曾孙张蓉镜(1802-?),字芙川,一字伯元,小名长恩,娶姚晚真为妻。姚晚真号芙初女史,夫妇皆喜藏书,有藏书楼名“双芙阁”,取夫妇字号为名,一名“小琅嬛仙馆”。孙镐(1733-1789),字丰谋,一字芭溪,号讷夫,昭文(今江苏常熟)人。贡生出身,曾任潞安知府。张子和之岳丈^①。

此书上尚有题识三则。一则是在卷末:“乾隆戊申(1788)九月中旬古吴黄氏得之虞山西城书坊。珍藏。此秘本也。”钤“尧圃”朱文椭圆印。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又字尧圃、尧翁,别署复翁、佞宋主人,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江

①孙原湘:《先府君行状》,《天真阁集》卷四八,清嘉庆五年刊增修本,叶十三上至叶十七上。孙原湘称张燮为姊夫(孙原湘:《跋祝京兆草书梁绍甫〈善政记〉及〈孝友堂记〉长卷》,《天真阁集》卷四四,叶七下)。



苏苏州府吴县(今苏州市)人。一则曰:“嘉庆己卯(1819)四月中澣虞山女史席佩兰假读三复,因志。”钤印“道华”。席佩兰(1760-1829后),清代女诗人,袁枚女弟子。名蕊珠,字韵芬,一字遗华,号浣云、道华、佩兰等,昭文(今江苏常熟)人,孙镐子孙原湘(1760-1829)妻。又一则曰:“道光庚寅(1830)秋七月皖桐女士方氏若衡叔芷获观。”钤印“若衡”“叔芷”“晚芳女士”。方若衡字叔芷,一字晚芳,方维甸之五女,适杨希铨为妻,工诗,著有《镜清阁集》。方维甸(约1758-1815)字南耦,号葆岩,桐城人,方观承之子,方式济之孙,贡生,累官至直隶总督。家有心兰室藏书。邵渠,清代画家,生卒年不详,字秀方,江苏常熟人。其馀几方印待考。据此已可见此本自乾隆至道光,在江南流传,至少迭经

吴县黄丕烈和常熟孙镐、张燮、张蓉镜三世收藏。

以下再略举数例。

《提要》 著录号	著录	旧藏家	藏印	藏印图示
017	《释名》八卷,汉刘熙撰,明吴琯校,明刻本。	丁氏嘉惠堂	钤印:“光绪辛卯嘉惠堂丁氏所得书”“四库著录”“后八千卷楼”“嘉惠堂藏阅书”	
082	《宋陈少阳先生尽忠录》八卷,陈东撰,清钞本。	张敦仁与古楼、顾广圻	钤印:“广圻审定”“阳城张氏与古楼收藏经籍记”“葆采”“张懋信印”	
094	《史记抄》九十一卷首一卷,明茅坤辑,明万历三年刻本。	朱恁之滂喜堂	钤印:“朱恁之印”“九丹”“仁者寿”“永清朱玖聘藏书记”“朱九丹”“永清朱恁之字淹颂号玖聘滂喜堂藏经籍金石书画记”	

(续表)

《提要》 著录号	著录	旧藏家	藏印	藏印图示
282	《圣学格物通》一百卷,明湛若水撰,于伦增编,明嘉靖十二年高简刻本。	曹寅、富察昌龄	钤印:“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印”“棟亭曹氏藏书”“墨香堂图书印”“玖聃”“朱桎之印”。	

按,丁丙(1832-1899)、张敦仁(1754-1834)、顾广圻(1766-1835)、曹寅(1658-1712)、富察昌龄均为清季名藏书家,不再着意介绍。张葆采为张敦仁次子,字子实,一字仲实,又字实父,号筠生。嘉庆己卯(1819)举人。张恂待考。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本《经鉏堂杂志》之收藏印记中有“古余珍藏子孙永宝”、“子实寓目”、“祖孙同游泮宫”和“张恂信印”。朱桎之(1859-1911后),字淹颂,号九丹、玖聃,一号琴客,又号皋亭,河北永清人。其藏书处为滂喜堂、丛碧篠。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著录此君两藏印,一曰“永清朱桎之字淹颂号九丹玖聃一号琴客又号皋亭行四居仁和里丛碧篠所畜经籍金石书画印信”,二曰“永清朱玖聃珍藏金石经籍书画记”^①。

慕氏收藏的名家旧物最集中的只有汉阳周贞亮一家,计有九种:

著录顺 序号	著录内容	钤印信息	钤印图示
028	《周易传义》二十四卷,宋程颐传,朱熹本义,明刻本。《书目》第8页、编例号数17作《周易集义》。	钤印:“疆中周氏宝藏” ^① “退舟”“贞亮”“退舟学人曾读之书”“汉阳周氏书种楼藏籍”	
031	《春秋四传》三十八卷,明刻本。见《书目》第8页、编例号数17。	钤印:“汉阳周贞亮退舟民国纪年后所收善本”“鄂中周氏宝藏”“贞亮私印”。	

^①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5页。

(续表)

著录顺序号	著录内容	钤印信息	钤印图示
038	《书经集传》六卷,清咸丰年间钞本。 《书目》第9页、编例号数17作明刻本。	钤印:“鄂中周氏宝藏”。	
049	《礼记集说》三十卷,元陈澹撰,明嘉靖吉澄刻本。 《书目》第9页、编例号数17作《礼记集传》。	钤印:“汉阳周贞亮退舟民国纪年后所收善本”“鄂中周氏宝藏”“退舟”“贞亮”。	
055	《诗经集传》八卷,宋朱熹撰,明嘉靖吉澄刻本。 见《书目》第9页、编例号数17。	钤印:“埭川世家” ^② “鄂中周氏宝藏”“武陵珍玩”“汉阳周贞亮退舟民国纪年后所收善本”“退舟”“贞亮”。	
334	《南华经》十六卷,明凌刻四色套印本。	钤印:“退舟心赏”“鄂中周氏宝藏”“玄思阁”“汉阳周贞亮退舟民国纪年后所收善本”“杨永之印”“朱氏珍藏”	
361	《百家类纂》四十卷,明沈津纂辑,明隆庆元年王嘉宾刻本。	钤印:“汉阳周氏书种楼藏籍”“鄂中周氏宝藏”“贞亮”“退舟”“晚喜庐”“中华民国三年五月汉阳周贞亮率男成侃敬造佛像一区愿一切图书永无灾厄”	

①此印用字偏古,故多家著录错误。如《国家图书馆古籍藏书印选编》著录明万历六年吉藩崇德书院刻本《二十家子书》藏印有“丧中周氏宝藏”(第十册,线装书局,2004年,第232页),台湾“国家图书馆”著录旧钞本《文史通义》(216.1 05185)藏印有“器中周氏宝藏”(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04cb50dc4ad34d27b1cff0aef90206fefDc-zNDU40&page=&whereString=IEBTdWJqZWNOXONhdGVnb3J5NCAi5Y-y5a245LmL5bG-sIg2&sourceWhereString=ICYgQHNVdXJjZV9zb3VyY2UgICllj6TnsY3lrbHlg4_mqqLntK-Los4fmlpnlusi0&SourceID=&HasImage=)。噩、𠂔古同字。容庚云:“噩即𠂔,又孳乳为鄂也。”(《金文编》“𠂔”字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77页)

②“埭川世家”印主为黄向坚(1609-1673),字端木,江南吴县人(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133页)。是书当先由其收藏,后归周贞亮。

(续表)

著录顺序号	著录内容	钤印信息	钤印图示
495	《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明王守仁撰,明万历二十四年熊惟学刻本。	钤印:“检过”“汉阳周氏书种楼藏籍”“汉阳周贞亮退舟民国纪年后所藏善本”“中华民国三年五月汉阳周贞亮率男成侃敬造佛像一区愿一切图书永无灾厄”“鄂中周氏宝藏”“周贞亮”“退舟”“书种”	
594	《古今辞命达》八卷,明胡正心纂辑,明崇祯十二年胡氏十竹斋刻本。又:《书目》第15页、编例号数1《二十四史》、第96页号5《文章辨体》也记作汉阳周贞亮藏,然不载于《提要》。	钤印:“汉阳周贞亮退舟民国纪年后所收善本”“贞亮私印”“鄂中周氏宝藏”	

按:周之桢(1861-1933),字贞亮,晚年以字行,又字子干,别号退舟。湖北汉阳(今蔡甸)人。年轻时应童子试,五场连冠榜首,被选为经心书院斋长。光绪三十年(1904)中乡举,次年取进士,放刑部主事,旋入进士馆。后奉派赴日本进修,毕业于日本法律专科学堂。归国后,廷试一等,分发邮传部襄办路政。宣统元年(1909)出任黑龙江财政局会办,次年转任保定高等检察署审判厅厅丞等职。辛亥革命后,历任法制局参事、资政院评事兼警察学校教务主任。后绝意仕途,曾先后在北京国立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授,于目录学有深入研究,与江西南城李之鼎合编《书目举要》。其藏书室有“晚喜庐”、“津逮宦”、“书种楼”等。周贞亮辑有《五百家骈体文章》八卷,《越缦堂骈文》四卷。撰著有《退舟文集》、《退舟诗草》、《晚喜庐随笔》、《丛书举要》、《昭明太子年谱》、《联雋》等。周氏1933年卒于武汉大学教席,晚于慕学勋(1929),当是周氏藏书在其生前因某种原故已成批散出了。

至于现存多大的慕氏藏书之史部中的方志所占比例颇大,其中以山东、河南两省的县志尤多的现象,其实朱文已经说得很清楚,即1933年怀履光买下时慕氏藏书是四万多册,1935年6月运抵多伦多时总量已达五万馀册,因为怀氏在1933至1935年间又陆续在各地购得一万册图书,其中包括山东、河南两省的方志和民国时期出版物。所以严格来说,那不属慕氏所有,是不能作为依据来评论慕氏藏书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述概》只是一篇不太准确的翻译文章。对“慕氏藏书”的概况和西传经过的描述,最早和最完整准确的是朱维信先生的英文文章。

多伦多大学郑裕彤东亚图书馆现存“慕氏藏书”的原收藏者山东蓬莱慕学勋(1880-1929),字玄父,一作元甫或元辅,天津北洋大学堂(光绪二十一年)毕业,在北京德国公使馆任中文秘书17年,业余亦投资银行业和矿业,担任过大学的教授、董事及社会团体的诸种职务,是清末民初那一代既有旧学根基、又通晓西方文化的精英之一。

慕氏去世后,加拿大英国圣公会河南教区主教怀履光满足了其家属之要求,以约合市价三分之一的10500加元的价格将慕氏的约四万册藏书整体买下。成交后,北京美国公使馆退休海军武官义理寿招募了十名中国学者花一年多的时间为慕氏藏书编目。1935年6月该批图书运抵多伦多入藏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时,总量已达五万余册,增加了怀履光在1933至1935年间陆续在各地购得的一万册图书,其中包括山东、河南两省的方志和民国时期出版物。1961年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转交给多大东亚馆时,留下了艺术和考古类的图书以及五千拓片。

有关慕氏藏书的简介和采购过程的原始档案现仍藏于多伦多大学图书馆。该馆还保留有义理寿主持编纂的慕氏藏书目录底稿。这份目录和慕氏本人在1920年代自编、自刊的《蓬莱慕氏藏书目》是了解慕氏藏书之历史面貌的基本资料。近年该馆编纂的善本提要则可让我们一窥其中的精华。

笔者的初步印象是,藏书是慕氏不太措意的副业,又因书主英年早逝,结果是其整体上显得凌乱芜杂,鱼龙并存。但因天时地利,其中不乏珍稀之物,且出于官府或收藏大家,流传有绪。作为我国为数不多的西渡北美的大宗私人藏书之一,慕氏及其藏书都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谨以此文抛砖引玉。

特别感谢多伦多大学东亚馆中国研究馆员乔晓勤先生,提供了本文使用的钤印和书影。没有他的帮助,此文是不可能做成的。

【作者简介】李国庆,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英美文学、文献学、图书馆学、近代中西交流史、海外中国学等。